

翼城县县委发动干部群众为明年的起步工作打好思想基础

粮食和糖蔗、花生等农副产品都获得最好收成

关系和相互往来。最近几天了解，在整个拉丁美洲，中国越来越受欢迎，中拉贸易往来，许多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的人们深信，从同厄瓜多尔共关系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因一些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生活、环境的声音和高声调，影响大脑皮质层的厚度、神经、脑细胞数目相同但各种大小不同，几种影响功能的酶也有变化。这一研究从科学上证明了环境的作为，为幼儿早期教育提供了科学上的依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证明，人的儿童期受到损害，要作最大的努力才能复原。印度教孩卡玛拉回到人间，虽然经过十多年的精心栽培，始终不能适应人的社会生活；日本成年横田田一深山独居二十多年，回到人群中很快就适应了社会生活。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婴幼儿时期环境的重要性。专家们认为，幼儿教育应当开始得越早越好。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十分薄弱。目前只有大城市的一些幼儿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开展了教学工作。这种状况应当改变，要切实加强保教保证，这是儿童保健的重要课题。他们建议，为加强婴幼儿智力发育和早期教育的科学研究和人员培训，各地要设立示范性幼儿园、实验幼儿园和保育所等，要成立托儿所业务研究室，吸收熟悉三岁以下儿童心理发展和教养的专业人员参加研究工作。

这次座谈会是由卫生部妇幼卫生局主持的。

要把农业搞上去，一是必须纠正只抓粮食生产的“单打一”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二是必须纠正正分配上的“一拉平”做法，坚决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三是必须纠正平均主义、搞指标和“一刀切”的错误倾向，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四是必须克服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句话，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三中全会精办精神办。

会议期间，委员们还列席了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财政预决算报告。座谈讨论中，委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

范亨为山东省政协主席。

## 辽宁工业产品质量提高

重点考核的产品绝大多数达到标准

## 山东举行人代会和政协会议

## 山东举行人大代

云和政协会议

## 为四化贡献才智和力量

## 尚桂珍为创成绩三延婚期

## 连续六十万米无次布

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织布挡车工尚桂生，今年二十九岁。她曾经表示不达到连续六十万米无次布不结婚。为此，她三次推迟了婚期。十二月七日，她创造了连续六十万米无次布的上海市最高纪录。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高高兴兴办了喜事。

一九七八年元旦，尚桂生操作的速度，温习织布操作的技术理论。双方父母希望他们在一九七八年春节结婚。尚桂生估计到“五一”节能实现四十万米无次布。于是，他俩决定把婚期推迟到“五一”节。

“五一”前夕，尚桂生果然达到了四十万米无次布的优异成绩。这时，尚桂生已经光荣加入了中

桂珍决心以劳动模范毛信贤所创造的四十万米无次布的成绩要求自己。为此，她埋头苦练单道工序基本功。达到“约会”日，小尚就让她爱的人张元挺帮看测猪仔听诊。贾尚志摄

国共产党，并被评为市劳动模范。荣誉给高桂珍增添了新的动力。她同小张商量说：要向五十万米冲刺进军；把婚期推迟到国庆节。国庆前夕，高桂珍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以后，她又登上了六十万米无次布的高峰。厂党委和普通区房管部门给她优先分配了住房。

每月的工作量，除了粮食工作，他一到粮管所就立即化做买票、排队、交款、领粮等繁杂的琐事，其余时间则用在学文化、搞技术、搞副业上。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一

陕西省原县城关镇成生村人，先后担任共青团干部、最近被共青团授予“新长征青年突击手”称号。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一

仅仪仗队成员之一，分送这艘巨舰远航。

种测水仪体积小，可以使测粮功石文生又研制虫害粮食三测仪，要一个人坐在电钮上，就可马

速粮食水分测定小速度快操作双提高三到四倍。成功电子温度、仅运用这种三测中心控制室，按上知道全粮站各

(据新华社)

## 鼓干劲 挖潜力

## 北京轻工业增产短线产品

本报讯 记者徐人仲报道：北京努力增产群众需要的轻工业品，今年头十个月，全市轻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二，高于重工业增长幅度百分之二点八。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北京轻工业战线广大职工鼓干劲，挖潜力，调查市场需要，千方百计

我国政府和厄瓜多尔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决定中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将是关系史上的第一件大事。这是意义上的新开端。

厄瓜多尔是拉丁美洲的家族。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为经济合作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百里海洋权所持的坚定立场称赞。今年八月，当选总统宣布宣誓就职。新政府表示要改革，以便把厄瓜多尔建成一遍享有民主、普遍的正义和关系方面，新政府的正确国际关系，并继续执行不结盟和厄瓜多尔同我国的关系。

厄瓜多尔同我国的关系，在七十年代初，当时的厄瓜多尔

产短线产品。今年一至一月份，电视机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二点二倍，家用家具增长百分之二十，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三，毛线、提花毛毯、合成洗涤剂、肥皂、纸张、泡沫、人造革、民用炉、冰箱等都有大幅度增长。许多产品质量提高。

## 十年代中拉关系

### ——祝贺我国同厄瓜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起  
九十年代我国同拉丁美洲  
局热烈庆祝这一具有重要  
的共同努力  
国必将得到  
中国希  
拉丁美洲国  
随着对  
希望同中国  
朋友希望  
科技和体育  
和体育方面  
交往还不很  
佳，那末在  
中国正式建  
立友好关系  
和承认中美  
关系正常化  
后，中美两  
国关系必将  
得到进一步  
的改善和发  
展。

冰山牌的确良、天纺牌衬衫、光学眼镜片、马路飞燕牌大用产品分别荣获金银质奖章和部级、市级和省级产品优质品。

工业和其他行业。本市今年收购计划，比去年之四成左右。

年

油等计划

作业、原油等二项指标都已提前完成了全年计划。

今年大庆油田以来持续稳产的一面。

个年头。职工们在油田外圈进行勘探，扩大开采范围；加强对老油田的改造工作，使生产保持了高工作。

## 史上第一件大事

### 多尔共和国建交

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主动宣布向台湾方面。近年来，我国同厄瓜多尔在经济方面的往来不断发展。现在，我国同厄瓜多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相信，在两国政府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进一步的推动下，两国关系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我们有更多的拉丁美洲朋友，希望同更多的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和相互来往。最近，我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整个拉丁美洲进步交往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经济大国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不少文化人士希望加快发展两国间在文化、科技、交流。如果说六十年代我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在七十年代在这方面有了较大发展，八十年代，我们深信，从厄瓜多尔开始，中拉关系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

# 我国和厄瓜多尔正式建交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六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厄瓜多尔共和国决定从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签署的建交联合公报全文如下。

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多尔正

式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赞赏厄瓜多尔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所作的努力,并支持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维护二百海里海洋权的立场。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对方的事务、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  
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  
和国政府商定，将在短期内互派大使，

并将各自首都为对方建立使馆及其执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陈 楚  
厄瓜多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米格尔·阿尔沃诺斯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王绍光

我国政府和厄瓜多尔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决定中国大使级外交关系。这将是关系史上的第一件大事。这是意义上的新开端。

厄瓜多尔是拉丁美洲的家族。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为经济合作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百里海洋权所持的坚定立场称赞。今年八月，当选总统宣布宣誓就职。新政府表示要改革，以便把厄瓜多尔建成一遍享有民主、普遍的正义和关系方面，新政府的正确国际关系，并继续执行不结盟和厄瓜多尔同我国的关系。

厄瓜多尔同我国的关系，在七十年代初，当时的厄瓜多尔

# 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王稼祥（追忆）



几十年来，毛泽东同志经常用我们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特别是同陈独秀、王明、林彪等几次重大路线斗争，教育全党，谆谆告诫我们不要上这类政治骗子的当。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对革命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林彪这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也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我们重温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认清王明的叛徒嘴脸和丑恶灵魂，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这对于我们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接受正反两面的教训，是有好处的。

## 一

王明，原名陈绍禹。这个人的后半生，是靠苏联的供养，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度过的。一九二五年，王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俄国人互相吹捧，彼此利用。在一九二六年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人来到中国，就选上了那个俄语蹩脚的王明为他的心腹翻译，随后又把王明带回莫斯科。一九二八年我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他安排王明为六大的重要译员，直接参加大会工作。此后，王明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的工作。

这时，我已转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大学读书。我与王明的支部生活不在一块，但是，我知道王明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莫斯科大搞派别活动，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同志就拉过来，不顺眼的同志就踢出去，打击和清洗了一批有问题同志的同志。对于我，王明曾经讽刺我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只会读死书，天天准备考试。此后，王明等逐步形成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集团（我没有在这个集团内），自封为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者，和反摆秋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

一九二八年，王明回国，在中共上海闸北区区委工作，不久即被捕，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波兰人（据说是德国人），花了很多钱营救他出狱的。闸北区被捕的政治犯，十有九人被国民党迫害牺牲，而他却保全了性命。

贪生怕死的王明，不堪当时的艰苦斗争，又于一九三一年溜去俄国，住在他在安乐窝。这时正是我党斗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正确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我军正确的作战方针，经过浴血苦战，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等率领下，爬雪山，过草地，倍尝艰苦，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益壮，又趁机返回国内。但是，这个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他的路线彻底破产以后，不顾党中央对他的帮助和挽救，全国解放后，又设法钻回苏联去了。直到一九三一年死去。

从王明的成年算起，前后在俄国居住长达三十余年，在中国的日子不过十多年。这仅仅是时间上的计算。更重要的是，从未研究过中国的社会和阶级状况，从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搏斗，不论是在赫鲁晓夫篡夺了领导权的时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握政权的时候，王明的一切，从灵魂到肉体，皆以俄国新沙皇为其靠山。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学会了仰人鼻息，身穿军装，就是一个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者，就是一个玩弄反革命阴谋的政治骗子。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中国革命。他怀着极大的反革命野心，反对毛泽东同志，妄想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把中国变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和殖民地。

## 二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围剿”以后。

一九三〇年六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要胜利》的“左”倾决议案，反对毛主席长期用首先去创造农村根据地，“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〇年九月我党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而这时王明却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打着“国际代表”的招牌，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下，从更“左”的方面反对这个决议案，批评立三还“左”得不彻底。不久，臭名昭著的王明写的小册子《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实质上是一个在明哲保身的革命形势下，继续发展“立三路线”，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政治纲领。当时，共产国际批准某些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别有用心地趁此时机发表这个纲领，一方面以此作为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的资本和工具，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妄想共产国际中别人的信任。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篡夺了中央领导权，反对毛泽东同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一年讲的：“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在开这次会议之前，他们就策划和插手了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王明在这会上实现了他篡党夺权的阴谋。在会上，撤销了瞿秋白、李

立三的政治委员，王明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跃上了中央领导职位。这件事，王明当时对我保密，事先事后都不告诉我。直到一九三一年，我到了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同志才给我讲了他们玩弄的阴谋。我在四中全会上曾发言对王明在上海时骄傲，无组织无纪律，拒绝党中央分配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我认为党员不服从党组织分配，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然而王明在会上趾高气扬，对我这一批评是不高兴的。六届四中全会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设什么积极的建设作用，却造成了我党领导革命时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

一九三一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冈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明扼要，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每逢回忆至此，感到无比的幸福，其情景，历历在目。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当时，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政治上，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完全照抄苏联的一套经验，不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任务的理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荒谬主张，企图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甚至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作为打击的对象。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政策。他们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上，闭眼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说什么“与国民党决战的时候到了”。在对待“福建事变”的蔡廷锴十九路军的政策上，不搞统一战线，反对争取和利用他们要求民主抗日的积极性，反而提出要打倒十九路军，这实际上是帮了蒋介石。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顽固地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的路线，硬要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王明领导的临时中央下台至江西苏区，要中央局开会讨论打赣州问题。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提出敌我力量悬殊，极力反对这一错误主张。临时中央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结果赣州打不下，损失不小。王明一天还经常不顾客观条件，在城市搞盲动主义的罢工罢市，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到极大的破坏，最后他们所把持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初搬到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江西中央苏区。

在军事上，王明极力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把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我军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地打仗一项。否定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政治工作原则。强调军队要“正规化”，照抄苏联红军的工作条例，取消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员会，以政治委员个人负责制。在军队工作中搞形式主义的一套。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一套所谓“新原则”，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把毛泽东同志的“诱敌深入”污蔑为“守株待兔”。将我党红军当年极其重要的“游击战”称为“游击主义”来反对。

一九三三年，第五次反“围剿”前，王明从苏联派来了李德，要中央完全听信这个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德国人，委任为军事顾问，使我党的军权掌握在这个人手中，得以将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完整地贯彻到军事工作中。记得有一次在李德那里开军委，我负重伤，带病参加，讨论如何对付敌人出动一百万兵力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这是毛泽东同志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提出的唯一能粉碎敌人“围剿”的英明决策。可是，却遭到李德等人的反对，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与敌人拼消耗”等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英勇作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丧失了主动权，党和红军都惨遭极大损失，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撤离中央苏区。这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结果。我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因身体受病折磨，没有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这使我终生痛心的事。

在组织上，王明等人实行极端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进行党内斗争，打击革命同志。他们的“钦差大臣”满天飞，落到那里，那里的干部就被整。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对他们要排斥的干部，一律给戴上“右倾分子”、“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最大的罪恶是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月的赣南会议上，他们把持会议，强夺毛泽东同志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权，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宁都会议上，在王明授意下讨论“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会议争论激烈，我当时是唯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

人，处于极少数。毛泽东同志的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毫无理由地被撤销了。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排挤于军事领导之外，指责毛泽东同志不愿攻打大城市是“游击主义”，逼着毛泽东同志到后方去。毛泽东同志曾对我说：“我们是少数，只好到后方去吧，革命不分前后方。”后来又讲到：“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

一九三四年，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了高峰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方法上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完全相对抗，它以极“左”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形势，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等。这条“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运动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红军被迫长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减到三十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城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亲眼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健，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宜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指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我参加了在贵州遵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并作了系统的发言。会议纠正了王明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危急的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胜利前进。

红军到达川康地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分裂主义活动。张国焘早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为了个人私利，和王明是有矛盾的。张国焘眼见王明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个人的青睐，比自己更加突出，十分妒嫉。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马上从莫斯科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摇身一变，成了王明的心腹伙伴。张国焘之能够被派到豫皖红四方面军，成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四中全会的把持人王明搞的。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自恃人多地多，又与王明一鼻孔出气，公开跳出来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用武力危害毛泽东同志，分裂党中央。这人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他早就与王明搭上了伙，是王明的同谋者。

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这个靠投机发迹的会议上头子，对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恶行径毫无悔改之意，对我津津有味地叙述他怎样晋升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了，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各国党的问题，满副得意嘴脸，毫无愧色；根本不提他过去所犯的错误，不提在他指挥之下中国革命遭受失败、濒于覆灭的痛心教训。他半点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更闭口不谈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重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反而恬不知耻地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厚着脸皮吹嘘他如何制定了“八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器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气愤，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托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断定这完全是骗人，是不可置信的鬼话，因为共产国际于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组，取消了东部和西部等机构，各国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执委会的指导下进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面派遣李德，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则是掌握我党军权，此阴谋手段出于王明无疑。当我谈到中央苏区遭到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时，他不耐烦，却把四中全会以来的所有错误统统推在别人身上。这些，都明显地暴露了他灵魂的肮脏，野心的狂妄，人民的爱戴，暴露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对人民事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仇恨。

## 三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继续抗拒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从极左跳到极右，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抗战开始后，苏联决定给蒋介石一些军事援助，蒋介石派了张冲为驻莫斯科的代表，还有一些联络人来往。一贯投机的王明，在莫斯科经常与张冲等人来往，其目的是了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窥测时机。遵义会议后，由于有毛泽东同志掌握，革命事业蓬勃向前发展，前途无限光明。王明坐在莫斯科的洋楼内，见到如此大好形势，按捺不住心中的私欲和野心，急忙找张冲冲讨国民党同意，经过军援关系与康生一块动身回国，企图坐收渔利，分享既得胜利果实。

王明回国之前，会见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得意是刚从陕北根据地来到莫斯科治弹伤，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还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座。斯大林同志问了我关于我党的情况，并问红军还有多少人？我回答到陕北只有三万人左右了。王明在旁马上插嘴说，还有三十万人。当时参加接见，文化大革命中充当天平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家支持王明。斯大林同志当然相信我说的数字，并指出：“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士而不是光吃粮食的。”当谈

话涉及到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王明这次回国后，毛泽东同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仁至义尽地给予耐心教育，希望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往犯的错误。但王明本性难移，回到中国立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抛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出卖我党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甚至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而王明讲的却是要一切都要服从国民党蒋介石的指挥，就是要将抗日的主导权出卖给国民党反动派。服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超过服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武装的方针，实质上是不要搞革命，不要搞斗争，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将印把子拱手让给敌人，好到国民党那里去当大官。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刻画王明，是擦了一副脂粉送上门去的臭女人，人家（蒋介石）不理睬。王明和一些坏人勾结起来，遥相呼应，阴谋反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又一次粉碎了王明一伙的阴谋，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不仅教育全党进一步认清了统一战线中的马列主义原则和阶级立场，而且使我党的力量一天天地壮大起来，避免了中国人民可能又一次遭受的灾难。

我在莫斯科治病之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把我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一年后，我回延安之前，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党的报告，报告由任弼时同志带来，同时由他接替我的工作。在讨论这个报告的会议上，我补充发言，讲了中国党目前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公开文件，另外还有内部文件要我带回国，呈交党中央、毛主席。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当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我带了这么个重要的文件，还有一些援助物资，回到了延安党中央。

王明当时在武汉工作，一听说我回国带了共产国际的文件，盘算不知他是凶是吉。毛泽东同志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那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那里那一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开会地点，而不以我党自己根据地延安作为开会的地点。不难看出，王明一心要搞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改变，随时随地奉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召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回去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内容，以及在莫斯科治病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在会上，大家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此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王明留在延安，任统战部次等职。而他的表现是负隅顽抗，抵制毛泽东同志的耐心教导，不承认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更有甚者，在党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运动时，他借口生病，不肯参加整风，消极抵制运动，拒绝党中央对他的挽救。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他，对他的处理是非常宽大的。但王明却无动于衷，仗仗外国势力死不回头。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的時刻召开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一系列指示，而王明在会上发言竟没有一点自我批评，丝毫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他还想依靠外部势力，来压制全党同志对他的帮助，受到全会同志严厉批评。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秋，王明又以出国治病为幌子，溜到莫斯科。他直接同接在莫斯科发表议论，因我莫斯科曾有过种神语言，言语，引起苏联领导人对我党许多误会和了解。赫鲁晓夫篡夺苏联领导权之后，王明同他们一伙打得火热，无话不谈。他把所知道的国内事情以及他不满意的地方，告给了赫鲁晓夫等人，这可以从一九五八年年初苏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文件中得到证明。王明卖国求荣的灵魂和苏联帝国主义走狗的真恶形象来了一个总暴露，成为苏联新沙皇反华出谋划策。王明先以苏联新闻记者的假名“波拉维奇”，在苏联《真理报》上登载反我党的文章。赫鲁晓夫登台后，他变本加厉，用自己的真名写黑文章，公开攻击和污蔑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向社会帝国主义献媚。苏联新沙皇也与之配合，抬举王明，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大量发行王明的黑书，一九六九年又有《关于中国革命》，一九七〇年有《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王明以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邀请香港特务的外国组织“大学服务社”去苏联访问。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叛党叛国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王明一次又一次的反党阴谋。在他的叛徒面前彻底暴露之前，毛泽东同志本着既弄清路线是非，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又尽力团结教育，进行挽救这一马列主义干部政策，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教育批评，指望他能提高认识，在尔后的实际行动中，把错误改正过来，重新作人，在党的七大、八大上，都保留了他的中委之职。但王明心不死，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他的帮助和教育，最后下死心叛党叛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朱仲丽整理）

奋战万里风沙线 真正造福于人民

##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进展顺利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三日电 新华社记者黄正根、傅上伦报道：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今春正式上马以来，进展顺利。“三北”十一个省、自治区的造林面积，已达到今年国家的计划指标。据一些地区的普查验收，造林面积比较实在，成活率也比较高。

今年“三北”各省、自治区的苗木种子工作也做得比往年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采种基地九处，良种繁育场六十个，各地培育的各种苗木基本上可供一九八〇年造林的需要。

与此同时，“三北”地区的十一个省、自治区都按照国家规定，顺利地完成了本省、区的防护林规划设计方案。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项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十分关怀和重视。国务院继去年年底批准这项工程上马之后，今年又批准由国家农委、林业部、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和“三北”十一个省、自治区的二十一位负责同志，组成“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为了计划、组织、指导这项建设工程的实施，林业部还设“三北”防护林建设局。

各省、自治区对这项工作也普遍加强了领导。陕西、青海、山西、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宁夏等省、自治区，分别由省、区革委会或计委主持，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会议，研究部署“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问题，一些省、区为此专门作出了决定。辽宁、内蒙古、青海由省、区革委会负责同志挂帅，成立了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设立了办事机构。

今年，记者长时间在“三北”万里风沙线上采访，耳闻目睹了这项工程的兴建是多么得人心、顺民意，极大地调动了“三北”地区人民的积极性。光是规划设计这件事，据九省、区统计，就出动了七千九百多人。他们精神饱满，不畏艰难，跑遍了万里风沙线和水土流失地区。长期奋战在野外，精心调查，精心设计。许多科学家和林业干部都非常关心这项工程建设，他们根据自己的多年调查和实践，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积极为工程献计献策。

中国林学会今年就组织了一批专家深入到西北高原和河西走廊，对防护林体系建设进行实地考察。北京林学院教授关蔚蔚写的《黄土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与林业建设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关永振撰写的《从沙漠角度看“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副研究员胡式之的《从植物生态观点对“三北”防护林建设的意见》、中国林科院副研究员高尚武的《西北风沙区现状和“三北”防护林建设的总体规划原则》等学术论文，对于开展“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科学依据。

为了培训骨干，“三北”许多地区先后举办了一些造林技术训练班、水土流失区造林规划设计和国营机械林场总体设计训练班。今年，林业部委托北京林学院在北京举办的“三北”地区县林业局长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就达一百九十二人。新疆、宁夏分别举办了农田防护林技术训练班，培训了二百一十八名业务骨干。

十二月十七日，中国林学会在北京召开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会议，来自各地有关方面的一百七十多名专家、学者和林业科技工作者，带着一百一十多篇论文，对工程一年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议，并就这项工程能否搞得更好和如何搞得更好，广泛交换意见。这将有助于这项工程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上，真正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子孙万代。

## 建议在桉树林区建立育林造纸联合企业

建立育林造纸联合企业，这在我国是一件新事。这个建议，值得有关部门参考。

——编者

前不久，我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林盟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温带、地中海地区速生阔叶树人工林技术讨论会，发展桉树、用于造纸的经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据资料介绍，由于桉树生长快，纤维较多，桉材适宜造纸印刷用纸，纸张质白，近十年来世界桉树人工林面积翻了一番。

参照外国经验，我建议：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区广泛提倡发展桉树，并在桉树集中林区发展造纸工业。这样做有

助于解决我国纸张不足、纸张供不应求的现状。林业部与轻工业部可以协商建立林纸联合企业，林业部投资营建桉树林基地，轻工业部投资建纸厂。

现在就可以选择栽培桉树较多较集中的广东省雷州林业局作为育林造纸联合企业的试点。这个局有人工林五万多公顷，其中桉树四万多公顷，加上附近国营农场和社队集体营造的桉树林，总面积约达五十万公顷以上。经营好这些人工桉树林资源，便可办一个大造纸厂。 祁述雄

## 再谈机电产品严重积压的问题

编者按：本报十月十三日刊登了《机电产品为什么严重积压》一文后，不少读者来信表示赞同，并对机电产品积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议。现从中选登三篇，望各地有关部门引起重视，及早解决这一问题。

## 我对机电产品积压的看法

读了人民日报十月十三日刊登的《机电产品为什么严重积压》一文，有很多感想，现结合实际，谈一点我的看法。

全国机电产品超储积压，除了该文所说的计划多变、盲目生产、质次价高、管理混乱等原因之外，还有以下问题：

一、代签合同。机电产品绝大部分属国家“统配”物资，由国家统一组织和分配订购。参加订货会议的人数虽然很多，但也很难做到供需双方直接签订合同，绝大多数由上级主管局代签。这样就容易造成品种规格上的差错，形成积压浪费。

二、层层设库。很多产品都是实行多级储备。一些行业，中央、省、局、分局、厂矿，都有储备。越是“短线”产品，各级都要储备，使该产品显得更短、缺，而库存量往往很高。

三、硬性分配。有时上级认为下级需要某些物资，就要下拨订购。有一个矿得到上级分来的进口圆盘给煤机两台，价值二十多万元，放置了二十多年都没有使用，又调不出来。

四、专业人材缺。有的大专院校

四川芙蓉矿务局 李 营

希望多登些这方面的文章

我是在工厂作物资工作的。现在国家搞四个现代化，在资金缺少、物资还不丰富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如此积压，势必要成为“四化”的障碍。近年来，全国大小中型各类物资调会、展销会，连续不断，然而机电产品的库存却直线上升，这种状况应该及时纠正。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怎样防止新的积压方面的建议和措施等，也可以介绍一些国外的物资管理的先进技术和办法。

河南省商丘拖拉机配件厂

张风梧

## 发挥当地自然优势 因地制宜种植作物

# 平度县粮棉油全面增产

本报讯 山东省平度县调整农业内部比例关系，因地制宜实行作物区域化种植，粮棉油全面增产。今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百分之五、八，总产量却增长百分之十；棉花播种面积扩大百分之三十五，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花生播种面积扩大不到百分之二，总产量却增长百分之二十。社员人均收益分配达到百元，比去年增加二十五元以上。

平度是山东省土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县，有山有水有平原，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景非常广阔。过去，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致使粮、棉、油的布局不合理，自然优势发挥不出来，影响农业全面发展。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把他们从单一经营的圈子中解放出来。县委通过深入调查，发动群众反复讨论，根据当地的土质、水利、气候和群众种植习惯，制订了区域化种植规划：东部、北部十个公社为花生集中产区，西部、南部十五个公社为棉花集中产区，中部二十个公社

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特点，尽快把“八山一水一分田”搞上去，使贵州的“干人”穷人富起来；这是贵州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

贵州省长期以来，在生产方针上、政策措施上，没有从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一自然条件出发，全面发展农业，而是单一抓粮食，使农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搞了近三十年，一九七八年全省粮食亩产平均才三百一十四斤，每人平均产粮四百八十斤，平均口粮只有三百

五十一斤，现金分配每人仅四十六元四角，是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收入最低的“干人”。

贵州位于中亚热带范围，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无霜期长，全年丰盛，四季常青，宜牧地区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三分之一，是有耕地面积的三倍。可惜的是，直到现在，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还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

## 农民喜交丰收棉



河北冀县东兴公社东兴大队建立棉花生产专业队，实行奖惩制度，责任明确，管理精细，棉花获得好收成，亩产皮棉一百二十斤。这是大队正向国家交售新棉。

新华社记者 赵连升摄

## 如何使物资不再积压

我是在基层生产单位搞供销工作的。我们厂只有十年的历史，今年产值二百零六万元，流动资金二十六万元，但库存物资达四百一十万元，其中积压物资占十二万元。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我们每年库存约以三十万元的速度递增。近几年来，我们积极参加当地举办的物资调剂会，并设专人负责处理积压物资，但收效很小，积压仍在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

产品不定型。我们每年生产的产品十儿至二十儿种，十年间中断生产的产品就有三十余种。每中断一种产品，都要积压一批物资。这种情况约占全部积压物资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未下达生产计划先订货。我们每年的生产任务一般都在当年三月份正式下达，但二、三类机电产品的申请计划都在上年度七月份编报。生产任务未定，物资的供方却仍按原报计划执行，不得不积压新的物资；

物资以年度为周期供应，生产单位只好以年度备料。材料和配套件的供方厂不以需要的时间来安排生产。有时需方急要的物质往往拖到四季度交货。为了不影响生产，工厂只好准备一年的周转量，这就增加了库存。

如何处理积压物资，避免再积压？我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一、调剂会要打破行业界限，手续要简便，特别是付款手续。

二、以县、市为单位将积压物资全部集中起来，规定任何单位购买物资，必须先向处理物资门市部起购。

三、处理不掉而又有用的物资，可以考虑以成本价退回物资部门或是生产厂。避免物资部门重复进货，生产单位盲目生产。

四、维修用配件和材料，以县、市为单位力求配足配齐，基层单位一般不应保留这种库存。

五、物资部门要以保障供应为宗旨。生产厂如任务变了，物资部门对原订物资不要强行推行出去。如果物资部门品种和数量都齐全充足，用户能象居民购买油盐柴一样方便，用多少买多少，这样，企业无需保留多少库存，物资周转期也可以大大缩短。

江苏省丹徒县农机修造厂 魏洪兴

为粮食集中产区，以北部大泽山公社为中心发展林果生产，以南部罗兰公社为中心种桑蚕业。在具体工作中，这个县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

从发挥当地自然优势出发，适合种啥就种啥。如地处山区的两目公社，土壤条件适宜种植花生，群众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一九六六年，全社花生总产量曾达到四百三十八万斤，到一九七六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近年来，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本地自然条件实事求是地组织农业生产，今年，全社粮、油亩产和总产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地处涝洼的白埠公社，土壤系黑粘土，含磷碱，宜棉不宜粮。一九七六年以前，全社皮棉亩产连续四年过百斤，粮食亩产一直没有超过五百斤。以后，粮食征购任务越来越重，逼得他们不得不丢棉保粮。一九七八年，粮食总产量虽然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五十八万斤，而皮棉总产量却减少了八十五万斤，得不偿失。今年，这个公社适当扩

## 贵州“干人”的富裕之路

——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特点出发安排农牧业

据调查，全省现有的五百八十多头牛，基本上只利用村边地角的青草，大片草地弃置不用。

从贵州农牧业发展的起伏过程来看，农牧结合是高度发展农业的一条客观规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省牲畜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点六，粮食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中，牲畜平均每年递减百分之十一、五，粮食平均递减百分之七、七；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十年间，牲畜一直在一百亿斤左右徘徊，粮食也在一百亿斤左右徘徊。由此可见，凡是以致促农业，正确处理农牧关系，农牧业生产就并驾齐驱；

单一抓粮，两败俱伤。许多先进社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牧促农，农牧兴旺，这确是一条富国裕民之道。

总结历史经验，针对现实状况，去年以来，省委制订了一系列促进农牧业发展的政策，如给社员划饲料地，提高投肥报酬，调整收购猪、菜、牛、羊的奖售政策等。并指出，凡是为发展正当的畜牧业而受到错误处理的，该平反的要平反。这些措施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生产发展很快。据上半年统计，全省生猪存栏数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收购猪菜牛、菜羊，分别比去年同

# 四川农民卖猪发愁

“饱和”状态的情况下，又值生猪出栏旺季，大批生猪涌来，商业部门自然承担不了。同时，屠宰和圈存条件也不适应需要。成都市目前日屠宰能力仅七千头，至十一两月共到猪四十八万多头，平均每天达八千头以上。多余肥猪杀不了，造成活猪圈存超容量百分之六十，连收购点的院坝、走廊都成了猪圈，重庆市活猪圈存最大容量为四万多头，现已达七万多头。由于饲养、屠宰能力不足，生猪死亡、急宰和掉膘损失增大。十月份成都市急宰和死亡的生猪高达五千四百多头。

目前，四川交猪难的问题已引起省委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注意，开始采取措加以解决。有关同志认为：当前实行计划、限制交售，虽然只是食品经营部门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看来，解决交猪难的根本途径是积极扩充经营手段，特别是冷冻、储存、运输能力。除此以外，还应当做到：改进经营，积极扩大内销；打通渠道，力争向省外调一些肉；努力开展腌腊加工，做到多销一些；轻工部门也要力多产一些肉类罐头；同时要改进宰杀、圈存工作，因地制宜地搞好代养、寄养和临临时饲养点。总之，做好旺季生猪购销工作，切实解决交猪难的问题，是当前四川经济工作亟待抓好的一个大问题。

## 开封花生丰收 社员超产得奖

本报讯 记者翟启通报道：河南省的花生主要产区开封县，今年种植面积八千亩，比去年增加十万亩。由于实行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社员管理积极，细心收获，产量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率较大，绝大部分生产队和个人都有产可超。丰收以后，分配政策不变？

超产奖励要不要兑现？县委的态度是：说话一定要算数，坚决按政策办事。

为了真正做到政策兑现，信于民，县、社主要干部深入生产队，进一步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文件，监督检查兑现情况，讲政策，表态度，给社员及时送去“定心丸”。

上面讲了，下边社有了胆，各个生产队坚决做到政策兑现，多劳多得，奖罚分明。范村公社超产队要算数，坚决按政策办事。

应得超产奖励三千多元，十月三十日，公社党委在这个队召开政策兑现、让社员抱“金娃娃”的现场会。生产队会计当场把现金发给三十二家超产户，最多的得奖三百三十三元。也有少数社员这次没有得奖，其中一个一亩户产出的花生七十二斤交给了集体。领到奖金的社员，无不笑颜开，有的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社员刘庆德说：“往后，我要带着全家好好劳动，争取明年抱个大‘金娃娃’！”







